

一個知識論述的省察 ——對台灣當代「自然寫作」定義與 論述的反思*

蕭義玲**

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

摘 要

「自然寫作」作為一種新的寫作型態在台灣文壇崛起後，便以豐富的寫作成果受到了眾多研究者的注目，並以其「新」作為定義與論述的起點。本文將把「當前學界如何定義與論述『自然寫作』之『新』？」的此一問題意識，放在「意義脈絡」的線索上思考，亦即我們將重新反思現前研究面對此一寫作課題的態度，以及其中所透顯出的時代問題為何？作為對「自然寫作」「新」意的關注，本論文將以：「自然寫作所內蘊的意義與時代課題」作為研究的重心，而問題總會引發我們對相應研究途徑的關切，因而，一個相應的研究途徑所意味的意義問題，亦是本文的研究焦點所在。

關鍵詞：自然寫作，自然書寫，生態文學，現代性，隱喻

一、前言

「自然寫作」作為一種新的寫作型態在台灣文壇崛起後，便以豐富的寫作成果受到了眾多研究者的注目，並以其「新」作為定義與論述的起點。然而值得思考的是，在一般文學研究中「定義」總是一後設的行為。亦即，「定義」總是研究

* 拙文承蒙《清華學報》兩位審查教授慷慨提供諸多寶貴修改意見，筆者已於文中悉數修訂完成，僅此致謝。拙文為筆者主持之國科會計畫〈走向自然之途——對台灣當代自然寫作的省察〉(NSC 92-2411-H-005-015)、〈知性語言或情感語言？——自然寫作的象徵性解讀〉(NSC 93-2411-H-194-030)之部分研究成果，感謝國科會提供研究經費支持，特此說明。

** 本文作者電子郵件信箱：chlhil@ccu.edu.tw。

者對於研究對象的意識行爲，在文學研究中，文本的寫作必然有先累積至一定數量，且這些文本明顯地不同於既有的書寫風貌，而後才有爲其歸類、命名，以凸顯其特質，並用以區別於其他寫作類型的需要。但以上的說法並不意味著在文學研究中，「下定義」是一件簡單的事：研究者只要就既定的創作成果作現象的歸納即可。文學類型的辨認畢竟不像植物分類那樣，可以用清晰可辨的外在特徵予以歸納，文學的分類本質上是一種詮釋行爲，是意義的闡釋而非自明的定性。「意義」並非自明自在的，它總需要人致力探求，不論是創作者或研究者，對此一特殊意義的發掘與多方探索，正是「新」的活力與價值所在，亦是此一寫作型態所以能繼續召喚後來書寫者加入的基點。因之，當我們以再後退一步的後設立場，檢視現前「自然寫作」的定義與研究時，我們其實是在透過「意義」的重新關注，反思人們面對此一寫作新課題的態度，以及其中所透顯的時代問題。作爲對「自然寫作」「新」意的關注，本論文將以：「自然寫作所內蘊的意義與時代課題」作爲研究的重心，而問題總會引發我們對相應研究途徑的關切，因而，一個相應的研究途徑所意味的意義問題，亦是本文的研究焦點所在。

二、召喚書寫的動機——從嘗試命名到專名的擬定

雖然一種新的寫作型態的書寫起點與物理時間的起點不能完全等同，但考量於台灣藝文界對自然生態相關主題的關切與參與，並有代表性作品的出現之故，一般學界通常以八〇年代作爲「自然寫作」(nature writing) 的萌發點。(註1)而遲至九〇年代，「自然寫作」一詞才被廣泛地接受爲定義性的「專名」，從早期的命名到九〇年代「自然寫作」一詞的定名，我們可以注意到幾個存在於命名過程

1. 現今研究談到台灣現代(或當代)自然寫作的興起時，多是以「八十年代」爲起點，且有共識性的說明。如劉克襄〈台灣的自然寫作初論〉：「一直到八〇年代初，《聯合報》副刊連續刊載韓韓、馬以工兩位女士一系列的『我們只有一個地球』，報導紅樹林危機、海岸九孔池濫建等問題，大多數的台灣民眾對自然環境的重要性才有所啓蒙。此後，以自然環境爲題材的作品，透過報章媒體的大量刊載，我們對自然環境的破壞才有比以往更具體的認識。／八〇年代初，正是臺灣的文學寫作逐漸走向分眾時，這類以自然環境爲題材之作品的適時出現，無疑是社會『分眾』裡最具代表特色的類型之一。」《聯合報》，1996年1月4日，34版；又，陳健一：「『自然元素』以較鮮明的形象出現在文學作品裡，該是八〇年代的事。是緣於七〇年代外銷導向經濟發展導致土地傷口處處的效應，一群關心環境的作家以土地、環境代言人的身分寫了許多自然爲主題的報導文學作品，藉以喚起大家重視自然生態。如八〇年代初期馬以工、韓韓的《我們只有一個地球》就是這一類的文章。」《誠品閱讀》17期，1994年8月，頁81-87。

中的問題。

(一) 嘗試性命名與出版

首先，命名的開始正好凸顯出台灣此類書寫產生的背景意義，因寫作所關懷的主題與台灣當時的生態環境有關，故此類寫作在產生時即具濃厚的現實色彩。八〇年代之前，在台灣本土意識的回歸與多方討論背景下，已有以環境生態報導為寫作主題的作品之產生，八〇年代以後，在媒體與出版社的推波助瀾下，此類寫作開始獲得藝文界的注意與參與，作品除揭發現代資本主義思維下台灣自然環境所遭遇的浩劫，更進而探討其中潛藏的危機，並將寫作焦點從人所屬的社會，轉向長期被忽略的自然環境（如山川沼澤綠林野地等）中，因此這一寫作型態的萌發，一開始便染有濃厚的報導性與即時性色彩，我們可以從尚未統一的多樣性稱呼中看出端倪，如：「環保文學」、「自然生態文學」、「環境文學」、「自然主義文學」、「自然寫作」、「荒野文學」、「土地文學」……等，^(註2)我們或可將此一時期暫名為「嘗試的命名階段」。顧名思義，從「環保」、「生態」、「環境」、「荒野」諸詞中，我們可以捕捉到作者於台灣當時的時空背景下所採取的寫作視角，以及所要觀照的特殊議題。但要注意的是，本文所以擬「嘗試的命名階段」名之，是因為這些命名背後都尚未有嚴謹的意指，當它們各以所要強化的某一特徵出現時，命名所需要的疆界座標每有鬆動的情形。如：若名之為「自然主義文學」，則應將此一「自然主義」當專有名詞，即西方藝術（文學）思潮上的「自然主義」（naturalism）流派與相關技法來使用？亦或只是一般意義上的一種朝向自然的主張或精神？^(註3)又，「荒野」或「土地」一詞是專指某一區別於城鄉之處的自然地

2. 關於這些「自然寫作」的前身稱呼說法，可參見既有研究，如見許尤美，《台灣當代自然寫作研究》第一章註二，（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年），頁9；以及吳明益，《以書寫解放自然——台灣當代自然書寫的探索》，第一章「確定論述的邊界：何謂台灣現代自然書寫？」第一點「賦名的變動：自然文學、環境文學，還是自然書寫？」，（台北：大安出版社，2004年版），頁4-9。
3. 「自然主義」與「寫實主義」關係密切，以下我們可循歷史發展線索解釋其內涵。「寫實主義」（Realism，或稱「現實主義」）：是在19世紀三〇~四〇年代形成，並取代浪漫主義的重要藝術思潮、文學流派。其形成背景是：在工業革命、自然科學的成就與資本主義的發展下，時代氛圍促使了一批作家以客觀的、批判的眼光來觀察世界。他們不滿足於浪漫主義思潮下對個人理想、叛逆精神與偉大人物的描摹，而紛紛把目光投向文藝復興、啟蒙主義時代的「面向現實」之傳統與古典主義文學的傾向中，以一般常見的日常生活現實為主要題材，致力於在文學作品中忠實地再現各種生活現象；「自然主義」（Naturalism）作為西方文學的一個流派則產生於19世紀下半葉的法國，而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傳至歐美和世界各國。其形成於當時的知識階層對「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歐洲兩大文學支流的不滿，認為不論是浪

景，或是隱喻性地指向人生存所依據之土地與自然？再如，當我們將「環保」與「環境」、「生態」區分為不同的名詞，需要在概念上加以區別的地方何在？以上疑問凸顯出意義明確之必要；第二個問題是，除卻一開始便出現的命名之一——「自然寫作」外，早期的各樣嘗試性命名中，在「環保」、「生態」、「環境」、「自然主義」、「荒野」等諸詞內涵還尚待釐清時，「文學」始終被視為一個「理所當然」（或無須多加考慮？）的類別屬性而存在著。然而，因為「文學」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存在，九〇年代以後，隨著自然議題的深化與專業化，在大量與「自然」課題有關的作品產生後，「文學」遂從「理所當然」的位置退位為此類寫作的一個環節（或次類），而「自然寫作」之名亦取代了諸多「〇〇文學」稱呼，甚而有之，「文學」是什麼？在強調科學性的知識語言運用下，「文學」是否還能保有學科疆界上的獨立性？竟成了此一寫作所內蘊的重要問題。

論述至此，我們已經點出了存在於此類書寫的核心命題，即它面對了兩種語言——自然科學下的「知性語言」（如生態知識與理論等），與文學下的「情感語言」（如想像與虛構等）的對話與共存之挑戰。而當我們標出此類書寫的核心命題時，定義所指涉的意義範疇，不也正反映出現代社會的重要命題——在科學話語的獨霸性中，以個人情志出發的「情感語言」如何與「知識語言」相統合、對話？當我們將眼光放在兩種語言之間複雜的辨證關係前，我們不妨再回來早期「嘗試命名階段」，看看命名者是站在怎樣的基礎上定義寫作行為與成果，亦即早期定義所賴以發生的條件為何？

1.

在「嘗試的命名階段」中，我們宜特別注意出版界在此一環節所發揮的力量，（註4）在出版界的推動之下，能否「召喚」出更多作者、作品的參與，是比是否擬

漫激情或揭露現實的手法與目的，皆已無法滿足一個變動社會中對文化新秩序的渴求，兼之當時社會實證主義、唯意志論等哲學思潮大行其道，因之，知識份子遂進一步將「寫實主義」與當時的科學理念、哲學思潮結合，從中衍出了一些新的藝術派別，「自然主義」便是最顯著之一，較諸「寫實主義」，「自然主義」更強調要按照事實以描寫真相，以為人性的決定因素與遺傳、環境因素有關，人亦永遠脫離不了經濟力量的掌控。但要注意，「自然主義」一詞雖來自繪畫藝術領域，主要成就卻表現在文學領域中，而有所謂的「自然主義文學」。簡單說，「自然主義文學」便是西方寫實主義文學發展到極致後蛻變的產物，也是生物學、遺傳學等科學理論影響文學創作的結果。

4. 雖現今學界多以八〇年代做為「自然寫作」的起點，但多未反思「媒體」（包含報業、書業）在此一寫作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以為，「自然寫作」作為一個新的書寫型態，所以在「八〇年代」被提出與大量創作、討論，乃至獲得研究的共鳴，是與當時媒體提出議題的推波助瀾有極大的關係。舉證如八〇年代初，

出一個具嚴謹疆界的定義更為重要的。以在「自然寫作」領域中，耕耘最勤最久，且最受注目的晨星出版社「自然公園」主題書系（1986年）為例，出版社負責人陳銘民先生於書系前的「自然公園書系出版緣由」開宗明義寫道出版動機，試歸納如下：第一，從全球性的視野看，環保運動潮流所代表的意義須加以重視，而文字記錄中，1854年酋長西雅圖在「誰能買或者賣大地上的空氣和泥土的溫暖」中那篇著名的「印地安人的騷歌——護衛大地的宣言」可視為最古老的「自然寫作」的珍貴文件之一；其二，自這篇著名的宣言以來，「到現今的20世紀，每年有大量優美而嚴謹的自然主義文學被創作出來……其中更以自然主義的文學為代表，形成一種深具反省精神的自然文化。」；其三，從全球性回到台灣本土，亦體現了此一精神：「在台灣，環保運動方興未艾，越來越多的人投入紀錄與觀察鄉土的工作，也愈來愈多有關本土自然的優秀作品，以各種形式出現。」以及「自然主義的文學與攝影，正是人類心靈與自然之間最真誠的互動、最忠實的呈現。」因之「『自然寫作』及其周邊所包括的創作，將是未來台灣文化一個非常重要的部份，它記錄了台灣土地的淪亡及重生的過程，而土地正是文化的主要構造。」（按：黑體字為本文提醒注意處）最後，陳銘民先生總結出版的意圖：

晨星出版社以其一向關心本土文學的立場，繼發掘代表本土文化的原住民文庫之後，又推出『自然公園』書系，寄望能為台灣的自然保育貢獻一份心力讓更多的人瞭解台灣，發現生命，珍惜土地，尊重自然，深愛我們的家園；也能為此種逐漸成形的自然文化資產留下重要的里程碑與見證。（註5）

韓韓、馬以工一系列的「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所觸及的對台灣自然環境正在遭受的浩劫報導，便是透過《聯合報》副刊的連載，挾媒體之力的大幅度報導以成功地引起議題，引發社會大眾的共鳴。在出版社方面，除時報、遠流、春暉……等出版社常有零星出版的自然書籍外，最受注目，亦發揮直接促進效果的便是標榜關懷本土文化的晨星出版社，該出版社於1986年推出「自然公園」書系，此一書系便是以有意識地催生大量自然書寫的作家與作品為出版宗旨（我們可以發現，絕大多數的自然寫作者都有在「自然公園」書系中出書的記錄，同時，對研究者而言，「自然公園」系列亦是了解台灣當代自然寫作成果的主要來源，至今不墜）。媒體與出版的力量推動此一寫作型態的發展，並引發讀者、研究者的注意與共鳴，至九〇年代不墜，如作為台灣自然寫作的中堅份子王家祥任台灣時報主編，且在副刊中強調土地、自然的觀念與書寫的重要性，一九九六年一月4、5、6日，聯合報副刊在其聯副跨年系列中，亦推出「境與心」系列，其中，劉克襄的〈台灣的自然寫作初論〉一文，成為之後該課題研究者必稱引的一篇，並強化了此一類書寫的特殊性。

5. 以上引文皆引自陳銘民「自然公園書系出版緣由」，該文收於晨星出版社「自然公園」主題書系各書內文的首頁。